

苏联改革的
道路和

问题

苏联改革的道路
和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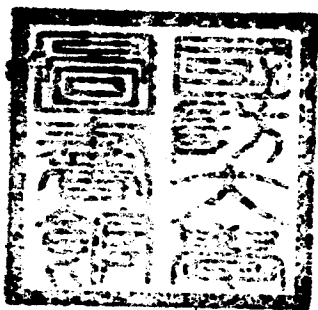
苏联新思维译丛



苏联改革的道路和问题

〔苏〕列·伊·阿巴尔金 著

张慕良 席真 译
余帆 周象光
屈洪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

Абалкин Леонид Иванович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ПУТИ И ПРОБЛЕМЫ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кономика», 1988

根据莫斯科经济出版社 1988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余运武

封面设计: 施本铭

苏联改革的道路和问题

〔苏〕列·伊·阿巴尔金 著

张慕良 席真 译

余帆 周象光

屈洪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中国科学院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6.5 字数:138000

1989 年10月第1版 1989 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12-0217-6/D·24 定价: 2.70 元

编者的话

列·伊·阿巴尔金的名字对于许多中国读者来说，已经不算陌生了。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他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从1987年起还是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之所以成为国际知名人物，主要还是由于他作为激进的改革者所进行的学术活动。他曾担任《工业生产的经济和组织》（《艾科》）杂志的编委，这家杂志早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前即已为根本改革苏联传统体制而大声疾呼，当年被认为是苏联改革派的主要喉舌。阿巴尔金发表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随着改革的大潮在苏联兴起，阿巴尔金作为一名声誉日隆的经济学家，成了对苏联高层决策最有影响的智囊人物之一。

这本小册子是阿巴尔金答记者问的辑录，收集了他接受苏联国内外报刊记者共16次采访的谈话记录，时间起自1986年9月，迄于1988年5月。这大体上就是苏共二十七大到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之间的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苏联的改革设想逐步明朗和具体，立法逐步完善，各项改革方案开始在基层逐步推开。旧体制遭受无情批判，但仍在运转。新体制则正在艰难地诞生，在许多场合还没有占据上风。新旧交替之际，传统观念蒙受强烈冲击，许多人免不了有疑虑，有误解。苏联报刊就群众迫切关心的问题，请阿巴尔金作权威的解释。与此同时，苏联的改革也引来国外不同政治色彩人们惊异、探询或困惑不解的目光，他们希望倾听苏联学者自

已的说明。这便是这本问答录产生的背景。显然，它与学院式的空泛之作毫无共同之处，它是一位经济学家对苏联社会的深刻变革的思索，是为推动这场变革所作的呼喊。

阿巴尔金是位直言不讳的学者。在苏共十九次代表会议上，他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各级党委第一书记和苏维埃主席由一人兼任的建议，曾公开表示异议。在这本问答录里，他以同样的直言不讳精神研讨学问，议论时政。无论是对改革作历史回顾或理论思考，也无论是对改革形势进行分析，他都“单刀直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无所回避地解释苏联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苏联历史上三次经济停滞的出现及其原因，苏联每隔20年出现一次衰退的现象，以及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改革的成败得失。他坦率地指出，不能把苏联几十年的实际情况等同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也不能把社会意识中习以为常的关于社会主义及其经济的观念看作真正科学的见解。他说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水平不断产生矛盾，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已不适应公有制的性质，经营机制的改革在整个生产关系改革中占有首要地位，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并不违反社会主义原则，以及如何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待破产、失业、竞争、非劳动收入、效益和社会公正的“矛盾”、企业自主经营同集中计划的协调，等等。他对新旧体制交替之际的困难更其无所隐讳，对改革遇到的阻力，对官僚主义、思维惰性等等，针砭毫不留情。

对于阿巴尔金这本问答录涉及的许多问题，中国读者大概会有某种似曾相识之感。中国同苏联当然有巨大的差异，但是苏联改革的情况和问题，又有许多与中国相同或相似。问答录中包含着不少曾经为中国学术界努力探索，而且至今仍属舆论兴奋点的热门题目。

例如,阿巴尔金反复强调,改革要克服社会主义所有制同它的主体的异化,克服人同管理工作的异化,使劳动者和劳动集体真正成为所有制和经营管理的主人和主体。一家日本杂志问道:社会主义不能像资本主义那样依靠追逐利润和剥削工人取得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那么什么是它所特有而为资本主义所无的刺激经济发展的动力呢?阿巴尔金对此举出了两个因素,一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另一便是社会主义“使人成为百分之百的国家主人和生产主人”。从原则上说,这种由主人翁地位形成的刺激劳动的力量是社会主义具备的,但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学会运用它,没有找到管理、经营和民主的相应形式”,所以才需要进行改革,以便“把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主人公感充分激发出来”。

又例如,怎样才能使改革进行到底而不致半途而废?阿巴尔金回答说,必须进行综合性的改革。经济改革要用政治体制方面的深刻变化,用“不受限制的公开性”来补充,“包括情况通报的充分性,讨论和言论的自由,对改革进程的批评,对计划经济机关工作的监督”,包括在决策的各个阶段贯彻民主精神,遵守民主程序。还要“革新社会意识”和精神文化传统,克服由于对大话空话厌倦而产生的“社会冷漠”或“社会意识疲劳”,“树立新的社会价值和观念”。阿巴尔金强调:“任何机制,如果没有公开性,没有民主原则,没有对人的尊重,就不会产生结果。”

这些论点(以及书中其他许多论点)大概是会使许多中国读者感到亲切的。

中国的改革与80年代苏联的改革相较,起步要早一些。很自然,阿巴尔金答问录涉及的问题中,有一些在我们中国已经经过了比较充分的讨论。阿巴尔金的某些结论,与中国学

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结论则是一致的。不管怎样,了解苏联学者的看法,通过苏联学者的议论了解苏联改革的历程和现状,总是有意思的。何况即使在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问题上,阿巴尔金也有不少颇富启发性的议论。例如,他援引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结果说,“获取非劳动收入的主要渠道,不是个体劳动活动,不是合作社生产领域,甚至也不是投机倒把,而是国民经济国营成分的工作”。就是说,钱是“靠停工、靠未完成工作量、靠出产劣质产品、靠违反各种物质资源消耗定额”弄到手的,而不是靠劳动赚得的。人们往往会囿于“旧的经济思维”而习以为常地将悖谬奉为真理,答问录却只用三言两语,就让人惊喜于自己的恍然大悟。

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学家之一,阿巴尔金对经济科学应该履行何种职责问题发表了看法。他强调,经济科学的主要职能是形成新的理论观点,革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清理过时的公式和原理,对现实作出理论概括。另一职能是掌握时代脉搏,跟踪实际发展过程,及时指出新的现象,包括消极现象,提出建议和预测,对改革方针提出修正意见,帮助形成人们的经济思维。科学在民主制度中要真正履行职责,对法令草案要发表意见,也可以以对立面的姿态出现。科学界不一定更正确,但应表明自己的观点,把观点连同论据拿出来研究。这些主张,大概也会使中国的学术界感兴趣的。

阿巴尔金写过好几本专著,我们却翻译了这本答记者问。谈话辑录这种形式自然不如专著逻辑严密,但是也有其优点。除了阿巴尔金自己提到的外,还有一点也十分重要,就是它比较通俗易懂。这不仅因为它使用口语,而且还因为提问和回

答都要考虑直接面对理论文化素养相差极为悬殊的广大报刊读者。我们希望，这本深入浅出的小册子在中国也能覆盖较大的读者群。

原书只有四个章标题。我们加了一些插图，一律用黑体字排。希望这样做能使这些互不相干的谈话的主题和观点鲜明一些，为阅读提供一些方便。

本书四位译者张慕良、席真、余帆、周象光分别依次翻译了一至四章，张慕良还翻译了原出版者说明。全书由屈洪校订。

目 录

原出版者说明	1
一、转折时期的经济：经济学的任务	5
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概念和问题	46
三、决定性的变化：起步时的困难	103
四、哪些问题是西方感兴趣的？	155

原出版者说明

我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进程日益发展，要求学者同报界人士进行对话。答记者问是最能达到预期结果和最有成效的交往方式之一。同读者、听众和观众的会见已屡见不鲜。答记者问在政论文章中风行之后，在书籍出版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一问一答形式活泼，适于群众发挥生动的创造精神，最符合列宁的民主观。

对于经济出版社这种专业书籍出版社来说，把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答记者问汇集起来加以发表，证明报界人士对经济现实的兴趣提高了。本书详述了我国改革中的困难和问题，详述了人们怎样寻求解决的办法和怎样制定本性经济改革的构想，可以使人对改革的情况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今天在电视、广播和报刊上谈话，也就是同全国人民谈话。答记者问这种方式使作者和出版社能帮助读者清楚地了解改革的情况。

《改革的道路和问题》一书生动地刻画了我们这个同根本性改革利害攸关的时代和社会的面貌。苏联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象一个焦点一样，集中反映出苏联人今天在为什么焦心。外国记者则表达了外国报刊对我国现实生活的关注。

每一次答记者问都独立成章，揭示改革的一个方面。出版社在编排时，不是按时间先后，而是按问题性质。这样的

顺序能帮助读者对改革的整个进程获得一个完整的印象。同时,能从中看到一种动态:问题和回答是怎样变化的;学术界的思想是怎样发展的;对社会和经济中的改革的实质和方向,在看法上是如何一步步改变的。

关于本书,列·伊·阿巴尔金回答了两个问题:

答记者问作为影响读者的一种方式,作为作者自我表现的一种方式,您对它的这一作用如何估价?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改革状况,除已发表的见解外,今天您还能作些什么补充?

1. 答记者问是今天正在进行的变革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同读者交往的比较新颖的方式。根据最近获得的经验,我对这一特殊的但却非常有效的方式十分赞赏。答记者问有许多明显的优点:它能对最迫切的问题、对人们今天所关心的问题作出迅速的反应。采用这种方式,无需转述人所共知的论点,无需讲老一套的话,而能如人们所说:“单刀直入”。

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好象能拆除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障碍,使人感到是在跟读者直接交流。这里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谁进行采访。所以我衷心感谢在采访过程中跟我交谈的那些人,即我们有条件地称之为记者的那些人(这些采访记录在收入本书时作了某些修改)^①。这些人有很高的专业修养,提问题尖锐而有分寸,在很多方面启迪了我的思想,使我能用新的观点来看这一或那一个问题,使我在进行论证时更有条理。

① 参加采访工作的有:Б·戈洛瓦切夫(《劳动报》)、Б·杰尼索夫(《苏维埃俄罗斯报》)、Н·热尔诺罗娃(《论据和事实》周刊)、В·克文特(《新时代》周刊)、Л·洛帕特尼科夫(《星》杂志)、Ю·雷科夫(《消息报》、《周刊》)。

还有,答记者问在时间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简直就是救命。写文章或写部头更大的著作根本抽不出时间。而准备一次内容即使较多的交谈,一两个小时也就够了。自然,事后对文字还要修改加工。

不言而喻,不能把跟读者交往的某一种方式同其他方式对立起来,把它绝对化。社会期待于学者们的不仅是就一些迫切问题举行答记者问,而且要写出一些有份量的著作,作出重大的理论概括。需要文章和专著,需要新的教科书。但就是在写作这些东西时,答记者问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和相当重要的前期工作。

2.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改革今天刚刚起步。还需要给它时间,还需要作很大努力。这本答记者问在阐明这些问题时,主要还是谈这一改革的必要性,谈它的任务和方向。

今天我可以完全重申过去说过的东西,但仅仅这样做已经不行了。政治经济学上的改革已经作为一个对过去的公式和论点进行再认识、批判地领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生活的教训并据以作出新的理论概括的现实过程而开始了。

至于说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工作,那么该所已经完成了一系列课题的研究,其中有:经济发展的新质,社会主义市场,开展经济竞赛和反对垄断,合作制,经营机制和经营管理理论,经济改革史。目前这些研究的结果还没有发表,但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有一项重大课题的研究,即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和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实现机制这一课题的研究,它的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经济问题》杂志上正在研究和讨论政治经济学的改革问题。

在这一方面,还在进行编写新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重要工作。新教科书应于今年即1988年年底问世。在编写过

程中,创作集体碰到了大量难题。一旦试图完整地、系统地阐述政治经济学,就尤其感到这些问题棘手。结果,教科书的编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不是都得到了满意的解决。

到头来,教科书的内容将只能反映政治经济学改革的起步阶段,始初阶段。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在理论上有所突破,把政治经济学的改革推向一个崭新阶段。这些任务的完成只好留待今后了。

我认为,今天主要的(也是最有意思的)事情不是谈论政治经济学上的改革和改革的任务,而是实实在在地、脚踏实地地干。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不论是谁都能有用武之地。

一、转折时期的经济： 经济学的任务

答《共产党人》杂志(1987年第5期)

记者：经济学现在有多大的把握来回答苏共二十七次异常尖锐地提出的问题？

阿巴林：苏共二十七次促使我国社会和人们的思想开始了一场深刻的革命性改革。代表大会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客观上业已成熟的需要，要求我们提出深思熟虑的政治解决办法并采取有力的行动。

经济学要进行质的变革，它不可能靠缓慢的“积累”得到发展

十分自然，在出现的问题当中，有许多是经济学不能不予注意的。这涉及把国民经济转上集约发展轨道的途径、经营机制的改革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解决。在这方面，学术界已经做了一定的前期准备工作。然而，人们责难经济学脱离现实，脱离实际需要，这是有充分根据的和完全合理的。经济学中的烦琐哲学和思辨结构积累得太多了，在需要进行质的变革、根本性变革的地方却拚命实行缓慢改善、局部改善的方针。

我们当前必须把各经济学科，首先是它的核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上一个崭新的阶段。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靠

缓慢的“积累”，靠从容不迫地增加知识，科学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如果一看到新现象就说它不过是“光辉地”证实了过去提出的原理，那就更加不会有任何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极其丰富的材料，经济领域中进行的深刻变革，要求实现真正的、创造性的飞跃和突破。这就需要对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进行改革，苏共二十七大已经指出了它的必要性。

不能要经济学对消极现象负全部责任

我们对各经济学科首先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状况给予批判性的评价，同时却不能不注意一个有原则意义的现象。这就是，有人企图要经济学对一些消极现象和经营机制的不完善负全部责任。这种在实际工作者中间广泛流行的看法是颇为伤人的。不仅如此，它还是有害的，因为它使人们不去分析消极现象的深刻根源，而且滋长理论上的虚无主义。

记者：在代表大会确定的发展经济理论的方针中，您认为具体有哪些探讨得最不够，但又最迫切，需要集中经济学家的力量加以解决？

阿巴尔金：学术问题难以按它们的重要性排队。今天必须在苏共二十七大确定的所有方针上，大力地全线推进。任何一个部门，如果不全盘解决积累下来的理论问题，如果不从所有这些问题的广阔的政治经济视野上去处理，都不可能得到稍微圆满的成功。

经济理论要首先研究所有制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在众多的问题当中，首要的是分析所有制关系的复杂结构、它所代表的各种利益、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其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这些关系起着奠基的作用，当前的大多数问题要得

到解决，归根到底都必须把公有制发生作用的社会经济机制探讨清楚。

第二是因为，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很不够，坦率地说是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所有制关系在一些著作中被描写得极其简单，好象是一个平面。对它的结构，它那原生的和次生的（派生的）形式，没有提供立体的概念。学术界就回答不了：为什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往往同它的主体异化，被看作是“无主的”？为什么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经济没有效率，缺乏活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遗憾的是，这种情况颇为常见）？

有人试图从经济关系的范围以外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提到气候条件，人口状况，自然资源贫乏等等），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只能证明科学的无能。

要在社会经济进步的道路上顺利前进，就必须揭示所有制关系及其实现形式的实际情况，从它们那丰富多采、复杂而又矛盾的方面去把握它们。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确定通过什么样的具体步骤使每个劳动者和每个劳动集体都把自己看作是并且确实成为所有制和经营管理的真正主人和主体。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使经济转上组织得好、效率高，使社会生产既有严格的合理性、又有人道倾向的轨道。

记者：现在提出了在社会关系体系中进行革命性改革的问题。在生产关系体系中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实质是什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这种变革不仅归结为经营机制的根本改革，而且触及我们经济生活的基础结构？

阿巴尔金：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革命性改造的一个特点，就是业已成熟的变革很深刻，很大，很彻底。这种改造触及的不是个别的环节或层次，而是生产关系的整个体

系，从生产关系的外部形式一直到它们的基础结构，包罗无遗。

生产关系的完善首先通过经营管理关系的完善来实现

但这种回答仍嫌过于一般，特别是在论证实际行动纲领的时候。因此，它还需要具体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证明，生产关系的完善首先是通过经营形式、经营方法和经营机制的改变来实现的（这一结论已由苏共二十七大的文件明文固定下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不断去适应经常发展着的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掌握科学技术成就造成刺激，为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潜力和优越性创造条件。

经营管理关系的完善所起的特殊作用，是由许多原因决定的。首先，正是这种关系（跟其他各组生产关系不同）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经济利益和经营活动，决定着人们的行为的动机。如果经营机制带有“浪费的”性质，如果经济核算、价格和劳动报酬的组织方法只是推动人们仅仅在产量上超过“已经达到的水平”，那么人们就不可能去精打细算，提高效率。

大多数其他生产关系和其他各组生产关系的改变，照例都不是直接实现的，而是通过社会主义经营机制和经营方法的完善来实现的。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充分和更有效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还要变革“深层”生产关系

但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性改革并没有就此完结。它还触及“深层”的生产关系（这是苏共中央 1987 年一月全会上的说法），即所有制、它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计划性。深层生产关系变革的特点在于，这里的变革不是要破坏，而是要揭示这些